

《青海史话》系列丛书

民族与
人文交流
漫谈

云公保太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交流漫谈/云公保太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4.6

(青海史话/谭奇策划，崔永红主编)

ISBN 7-225-02594-5

I. 文... II. 云... III. 文化交流—文化史—青海省

IV. K29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53531号

《青海史话》系列丛书

总策划 谭 奇

主 编 崔永红

副主编 任 斌

民族文化交流漫谈

云公保太 著

出 版：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 行：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6143426(总编室)

发行部：(0971) 6143516 6123221

制 版：西宁时代纪元(彩印)公司

印 刷：兰州人民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50

字 数：80万

插 页：6

版 次：2004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 000

书 号：ISBN 7-225-02594-5/K·170

定 价：80.00元(全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到装请与工厂联系)

《青海史话》序

青海省省长 杨桂堂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源泉，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青海历史悠久，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是中华各民族相互交流、融合、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在这块神奇、广袤的土地上，上演过无数震撼人心的历史活剧，涌现出很多千姿百态的风流人物，积淀着厚重旖旎的人文底蕴。所有这些，为我们开发青海历史文化资源提供了丰厚的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积极向上的精神财富，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生动鲜活的乡土教材。

为了响应省十次党代会提出的开发利用青海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的号召，省志办依据我省地方志史料，策划编写了《青海史话》丛书，其意义是深远的。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中自然也包含着精神的滋养。地方志对于当地的百姓，

实为人人应知的乡土知识。青海的建置沿革、历史事件、山川风物、民情民俗、地理特产、著名人物等等，生于斯、长于斯的青海人，岂能一问三不知？爱国首先得爱乡。懂了先民们终日矻矻、自强不息的开发史，开发西部、建设青海的信心就会更加坚定；知道了青海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史实，贯彻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自觉性就会进一步增强；掌握了山川气候的变迁、牧场退化的规律，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必要性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刻。凡有所学，皆有所用。

《青海史话》丛书，以普及地方志知识为宗旨，突出系统、真实、生动、简明的特点，坚持高质量、低价位的市场导向，有较强的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贴近现实，贴近生活，使大众能买得起、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我相信，《青海史话》的出版，将进一步增强全省各族人民的凝聚力，激发人民群众热爱青海、建设家乡的热情，以史为鉴，认真汲取开发青海的经验教训，把青海的事情办得更好。

2004年4月26日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1

●古代社会生活中的“文明典范”/9

①宗日遗址的“文明餐具”/9

②南凉国中的“儒雅之风”/13

③青唐古城的“多元文化”/19

●寺院建筑中的“多元文化展示”/26

①青海藏传佛教名刹的建筑艺术/26

②从东关清真大寺的修复记载看民族情亲/33

③循化张尕寺的启示/36

●神山圣湖中蕴藏着的多民族文化/41

①那摩！青海湖/41

②阿尼玛卿雪山透出的真情/47

③宗喀巴是来自汉地五台山的高僧吗/54

●歌舞说唱中融汇着的各民族“至真至爱”/61

①青海花儿——各民族团结的吉祥花/61

②《格萨尔王传》中的团结颂歌/67

③玉树卓舞与“嘉那朱古”/75

●高原饮食文化中的民族情结/79

①石磨里的兄弟深情/79

②青稞酒香里的土汉情谊/83

③茯茶茶香飘万家/87

●民众心目中的文化交流使者/91

- ①关公与高原藏民族/91
- ②高僧大德报国心——三世章嘉国师/95
- ③金麟山上的“阿米刘琪”/101

●古寺中凝聚着的历史文化结晶/104

- ①土楼观——诸文化交汇之处/104
- ②凤凰山拱北与青海伊斯兰文化的传播/109
- ③仰华寺与蒙、藏、汉等民族的文化交流/113

●青海古代多民族家庭漫谈/120**●专家学者谈青海各民族文化交流/130****●附录/138**

主要参考文献/138

写在前面的话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在青海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可以说，从远古时期，青海的文化就具有多元兼容、开拓奋进、与天地和谐的精神底蕴，很早就打上了多个文化相互撞击、融合和交流的深刻烙印。

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人们能够比较粗略地了解到，青海的先民在这片河流如发、湖泊似星、群山如龙般起伏的广袤土地上有声有色地生活着。如从小柴旦湖东南岸出土的3万年前的雕刻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表明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青海文化是丰富多样的，人们是充满活力的。又如在今格尔木市以南的东昆仑山中发现的经过人工磨制、非常精巧的贝壳装饰品和一些石器距今已有1万年左右。这表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青海先民在文化的内容方面逐渐深广，已开始显现出一定的艺术魅力。而从贵南县拉乙亥乡出土的能够使生活多彩的调色板；使食物更加精细并易于消化的加工谷物的研磨器；缝制兽皮以抵挡风寒的骨锥和骨针，都表明了拉乙亥遗址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已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其文化内涵进一步丰富。

人们所熟知的以原始农耕文化为主的新石器时期马家窑文化分布很广，在今甘肃、宁夏和青海境内都有分

布。此外还有新发现的宗日文化。在马家窑文化中，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绘有 15 人分 3 组集体舞蹈的纹彩陶盆；宗日文化中，宗日遗址出土的绘有 24 人分两组集体舞蹈的纹彩陶盆，看上去均像是在刚刚收获的土地上，劳作后的人们尽情欢唱着赞美自然万物的动人歌曲，他们手拉着手，围成一圈，踏着欢快多变的步子，扭动着优美、健康的身驱，渲泄发自内心的激情。集体舞蹈的纹彩陶盆显示出了 5000 年前的青海先民们亲如一家，以及他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团结协作，追寻幸福生活的真实画面。同时，也充分反映了青海这一时期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开放性以及先民们乐观开朗、直面人生的性格。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这两件充满动感和情感的稀世珍宝，是青海远古先民大交流、大团结的最好象征。在这里，还要提出的是，今同德县巴沟乡宗日遗址出土的餐具——骨勺、骨叉和骨刀，其造型与现代的钢质餐具模型非常相似。面对 5000 年前“文质彬彬”的骨质餐具，再看看被人们称为西式餐具的钢勺、钢叉和钢刀，令人惊叹之余不由脱口而出道：我们先民的生活是文明的，他们的文化交流是在理智性的基础上稳步而有序地进行的。

纵观青海远古文化，继马家窑文化之后，缓缓进入的青铜器时代的文化先后有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上述文化有的相互交叉，相互并存，关系密切，有继承，有融合，也有发展。无论是视为先羌文化的马家窑文化和宗日文化、齐家文化，还是视为羌人早期文化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都是具有卓异风彩的远古文化。这是青海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特质，也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青海最早的古老民族是羌人，羌人很早就居住在以青藏高原为基地的我国西北广大地区。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就是带领以西部羌人为主体的治水大军，导川凿山，自西而东循着黄河的走势东进中原的。这次羌人伟大的治水工程不仅促成了中华远古各民族的大组合、大融合，而且促进了当时不同地区间文化的大交流。夏、商、周时期，不断从青海等中国西部各地进入内地的羌人在我国古代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与各王朝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大量留居在青海高原及河湟故地的西部羌人继续保持与中原王朝早已存在的各种形式的联系。特别是在西周王朝时，羌人与西周中央王朝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从《穆天子传》以及《竹书纪年》等古书中有“周穆王西巡或西征，在昆仑丘”，见“西王母”和西王母来见周穆王“宾于昭宫”这样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虽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一时好像难辩真伪，但剥去一层神秘的面纱后，人们不难发现，这些上古传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西部羌人与西周中央王朝间的交往已具群体性，规模也不小，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而且这种交往从一定意义上讲，实际上也是上古各民族相互间一种文化的大交流，所产生的影响非常深广。

春秋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因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原来固有的种族文化，不断被打破，随后又不断重组、整合。此时青海的文化（包括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居处建筑、神话传说等）已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西部羌人的游牧之地，真正意义的经营西部也起于这一长达460多年的漫长时期。由于秦汉时期，特别是两汉时

期，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局面。青海东部地区的羌人曾有过六次大的主动或被动的东迁。而留居下来的大大小小的羌人各种姓部落，虽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他们时而为了复仇或寇掠结成短暂的、松弛的联盟，时而又互相抄盗，相互争雄，纷争不休。与此同时，生活在河西走廊一带的月氏人因遭匈奴攻击后有一部分人南迁到青海河湟一带与湟中羌人杂居，后来又与从内地迁入河湟的汉人错居。由于与羌、汉等族人民友好相处，互相交流融合，在史料中又称其为“湟中月氏胡”、“羌胡”等。这一时期，中央王朝势力深入青海地区，并有不少大的具体措施，例如反击匈奴、开通河西（为西汉进一步占据河湟地区奠定了基础），进兵湟中，平定河湟羌人，并在河湟屯田。与此同时，在河湟地区设置护羌校尉、金城属国，建立郡县，并构筑亭燧要塞，以加强对青海各羌人部落的控制，稳定边疆秩序。由于在大规模屯田时，兴建水利灌溉设施，以及从内地引进先进的耕作方法和生产工具等，对促进青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而这种经济的大发展，又实质性地促进了青海地区羌、汉等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和文化的大交流。

魏晋时期，魏蜀争夺河湟地区的斗争持续不断。曹魏对青海东部地区的苦心经营，带来了“家家丰足，仓库盈溢，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的较为富足、安定清明的政治局面，同时，也促成了河湟汉文化的兴盛。青海河湟谷地的地方豪强大族也逐渐兴起，著名的有郭、麌、田、卫四大姓。到了西晋时期，中央王朝对青海河湟地区也和其它地区一样，采取了奖励农桑，兴办学校，选拔人才等措施，使得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各民

族文化的交流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也就在此时，道教文化开始传播到青海地区。

十六国至隋代，先后统治青海或在青海展开角逐的区域性政权有前凉、前秦、后凉、后秦、南凉、西秦、北凉、北魏、西魏、北周和吐谷浑等。这一时期，由于民族的大迁徙和社会大动荡的影响，青海地区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都有了新的变化。虽然青海东部地区农业生产因此而受到影响，甚至某些阶段有某种程度的萎缩和衰退。但是，由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鲜卑吐谷浑人大批迁入青海中西部，这些地区逐步由氏族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并开始实行了封建制度。其结果，使得青海广大中西部地区牧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与牧业生产相适应的青海手工业此时也表现出时代和地区的民族特点。而且在这一时期，随着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复兴，青海农牧区之间、青海与南北朝诸政权之间、以及东西方之间的规模不等的商业贸易也随之兴旺，繁荣了当时青海的经济，促进了更大范围的民族间文化的大交流。这一时期，儒家的兴起和教育的发展，使得汉文化不仅在河湟地区的汉族中，而且在南凉的秃发部贵族和吐谷浑的王公贵族以及羌人贵族中传布，人们开始倾向于学习汉族传统文化且不少人（包括秃发部、吐谷浑、羌等民族的许多人士）有了很深的文化功底和儒家修养。汉文化在青海的兴起，再加上佛教文化的传入，以及地方文化的兴起，可以说说明这一时期青海各民族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各民族的文化是彼此吸收、共同发展的，文化的交流是成功的，也是丰富多样的，可以称之为青海文化交流史上最具活力和风彩的一大章。而这一切我们还能

够从当时修筑和扩建的城池、桥梁、寺庙等建筑，还有青海地方史料中记载的狄乐、羌乐、凉州乐等地民族音乐，以及出土的文物中再次得到印证。

唐代，由于吐蕃逐步占据和统治青海全境，地方文化中吐蕃文化的特征越来越鲜明，而且这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呈现开放性，不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历史也证明了由吐蕃文化转而形成的藏民族文化，大量吸收了当时高原上的羌、吐谷浑及汉文化等的精华，并日益丰富和多彩。而汉族等其他民族也从藏民族文化中吸收了不少精华部分。唐代诗人陈陶“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和白居易“元和妆梳君记起，髻堆赭面非华风”的诗句，正是对这种文化相互交错影响和渗透的反映，是吐蕃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影响的生动写照。

到青唐地方政权及宋、金、西夏在河湟的交替统治时期，宋代人称之为“蕃书”、“蕃字”的藏文已成为通行的文字，广泛流行的藏传佛教成为宋代青海吐蕃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藏传佛教传播史上广泛称颂的“下路弘传”，其中心就在青海东部地区。在藏传佛教普遍流行的同时，吐蕃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和原始的本教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相反，不少内容吸入和收进藏传佛教文化的系统中。同时，它与在河湟地区传布和发展的汉传佛教、儒家文化以及道家文化等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呈现出开放共兴的局面。

元明时期，蒙古族大量涌入青海，随之而来的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也在青海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蒙古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使得青海文化呈现更加多元化的特色。这一时期，儒学与科举在少数民族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藏传佛教的盛行，不仅使寺院僧团发

发展成为带有宗法性的政治和经济实体，同时也成为藏民族教育和文化的中心。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在青海河湟地区的传播，使得伊斯兰文化成为青海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朝前期，宗教文化普及更广，儒学教育更具规模，寺院教育和经堂教育成为青海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青海地方文化中，藏族、回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等，学习各门学科大多要通过寺院，就是一般的识字教育，也要靠寺院完成。各大寺院不仅在宗教上，而且在语言、文字、历史、医药、历算、彩绘、建筑、雕塑等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如以汉藏风格相结合为特色的塔尔寺建筑及其艺术三绝“酥油花、绘画、堆绣”，以绘画、雕塑享誉遐迩的热贡艺术，位于西宁东关的以阿拉伯为主，兼有汉、藏等多重民族风格的古代西北伊斯兰建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花儿”、“拉伊”、“安昭舞”、“骆驼舞”等歌舞艺术，还有各民族以说唱形式流传着的大量的史诗、叙事诗、神话、传说及寓言故事等等，这一切使得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呈现出鲜活性和主动性。特别是其中的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与古希腊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同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这部史诗中，强调藏汉等民族间的团结是其重要的内容，包含着大量爱国统一的思想。

近代以来，青海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加之受国际国内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出现了诸多新变化。其表现主要在，除传统的格律诗词的创作进一步发展外，新兴的白话小说、新诗体和散文也渐渐引人注目，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影响。戏剧、歌舞、音乐等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青海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

期。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以及与国内外的文化交流从总体上看，呈现出不断拓宽和较快发展的势头。这一点从民族人士在自己的家乡兴办学校的活动中也能看出一二。如土族朱喇嘛办学，鼓励各族子弟上学读书学习现代知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各民族进入了真正平等、团结、互助的时代。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是在各民族自己文化繁荣和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党和国家不仅一贯重视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并将此写进神圣的宪法，而且不断强调和加强各民族间以及国内外的文化交流，使他们互相学习，增进了解，加强合作，积极主动地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一切举措，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增强了各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可以肯定地说，文化方面的大交流促进了青海经济的大发展、政治的大稳定和民族的大团结。

古代社会生活中的“文明典范”

理性地思考面临的问题，大胆地吸收周边族人或民族的精华，因而骨质的餐具透出文明，雄烈之风中含着儒雅，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呈现出多元的灵性。

一、宗日遗址的“文明餐具”

宗日遗址位于今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巴沟乡。这里可耕可牧，气候不太寒冷，景色也不错。因这里水草丰美，野兔繁殖得很快，一些人还起了个“兔儿滩”的名字。1982年，一群专寻地下文化的文物工作者，在全省文物普查时发现了沉睡在地下几千年的古代人类所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经过挖掘考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目前黄河上游发现的时代较早、面积最大、内涵极为丰富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出土的文物的确让世人大饱眼福，大开眼界。经过3年的挖掘，宗日遗址共开挖探方31个，清理墓葬341座、灰坑18个、祭祀坑18个，出土文物23000余件。在这些出土文物中，有舞蹈图案彩陶盆、二人抬物图案彩陶盆、骨叉、骨勺等物；有大量出土的陶器，其中有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及齐家文化器物的存在。这说明

了宗日遗址延续的年代较长，并受到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占多数的宗日特色的新器物，如乳白色陶上施紫红彩、变形鸟纹和多道连续折线纹等等，构成了独特的区域性文化。在宗日遗址还发现了石棺葬具、二次扰乱葬式、火焚葬具、墓上标志、墓祭等，为青海及至西北部远古部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性实物和遗存。引人注目的是，在众多精美的出土文物中，出土于宗日遗址沙沟东侧第四坪台的骨制餐具——骨叉、骨勺各一件和骨刀若干件，可以称之为今日西式餐具的模本，特别是骨叉的形状和尺寸与现代人们所用的钢叉几乎一样。古老的骨制餐具的出土，似乎一下子打乱了人们固有的传统观念，就像在高原腹地看到沼泽和溪流中游动的观赏性金鱼一样，令人一时大惑不解。但是，科学发掘证明了这一件件真实而不虚假的实物是 5000 年前青海古人使用过的餐具，而且现已陈列在建筑规模宏伟的青海省博物馆内，供人们观赏和研究。笔者曾因此数次到博物馆参观，看着静静摆放着的骨质餐具，脑海中不由浮现出青海古人的生活场景：驯养的动物点缀在群落四周的草丛树木间，人们在比现在要温和的多得自然环境中，或牧或狩或收获野生谷物。每个人都性情乐观，勤奋劳作，深深热爱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他们的生活有浪漫也有理性，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与生活息息相关，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骨制的餐具，就像一件件附有灵气的神器，使古人充满一种自信，一种智慧，一种力量。

宗日遗址距今约有 4000~5600 年的时间。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眼中，那个时代的青海古人最多只会打磨简单的石器，基本上过着茹毛饮血的非常原始的生活，还